

文学名著

中国古典

文选

宝库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中国古典文学宝库

第一辑

延边人民出版社

(全一百三十二辑)

责任编辑：桂镇教

责任校对：广 宇

中国古典文学宝库（全 132 辑）

齐豫生 主编
夏于全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2010 印张 50000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648-284-9/I·82

印数：1—2030 册 定价 9600.00 元

中国古典文学宝库

编辑校勘委员会

特邀顾问：	庞存周	傅正义		
主 编：	齐豫生	夏于全		
副 主 编：	杨泰峰	王茁芝	李自然	
编 校：	齐豫生	夏于全	杨泰峰	王茁芝
	李自然	周广宇	李成武	周兴华
	丁 妞	李克勤	殷光奎	朱汉军
	潘启龙	潘国平	田 爽	尹建军
	顾墨溪	常 桦	陈大禹	韩中东
	郑中尼	文玉俊	彭新岸	曹振亭
	杨学文	何春霞	汪 伟	王 燕
	高宗翰	夏咏之	龙翔云	宋文革
	唐建业	张咏梅	冯玉范	郭通古
	赵天跃	孙崇尧	孔文澜	郑处玄
版式设计：	博 乐			
排 版：	韩建峰	张 丽	赵秀平	汤小琴
	王一帆	张红芳		

前言

体系完整、新颖、内容博大精深的文学集成《中国古典文学宝库》问世了，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在创造高度发达的古代物质文明时，更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文化。他们世代继承和发扬勤劳、勇敢、不屈不挠、富于创造与抗争的精神，使中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历史不曾被割裂的伟大国度；也使我们祖先创造的古代灿烂文化得以在历史的延续中生生不息地发扬光大。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中国古代典籍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华民族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反映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展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创新，充满希望的伟大的民族。

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出版，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最成功的和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撰。《四库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归类，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一次非常系统的整理，脉落清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以后，不少古文学家继续致力于古代典籍的整理，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但是，时至今日，类似于《四库全书》的成功之作还未发现。很多古文学家们的整理多集中在点滴上，失之于深和细，忽略了体系的完整和读者不同层次的需要。

当前出版的许多古典名著系列读本，虽颇具一定的系统性，亦只是就某一方面来说。若从对文史纵向和横向的把握来看，还显得有些底气不足，还不足以让读者通过这些读本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在人类文明向东方复归的趋势日渐明朗的今

天，迫切需要一部既能反映中国古代文学整体面貌，又能在规模上符合广大读者要求的精品之作，来满足广大读者重新审视和借鉴传统文明和文化，创造更为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和文化。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谨此郑重推出《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一书以飨广大读者。

本书虽是文学集成，但选材广泛，涉及领域非常宽广，虽不能说是见缝插针，面面俱到，亦可谓广博精微、包罗万象，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一览无遗。从纵向看自盘古开天以来，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五千年华夏文明兼容并包；从横向看，不仅涉及到中华民族的各个地域，更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古代科技、文化、养生、交友、家训、权谋、法制、天文、历史、地理、算术、哲学、医学、民族、宗教、外交、行政建制、地輿等诸多领域，可以说九流十家，尽在其中。所收人物上至帝王将相、富豪大贾，下至黎民百姓、百工艺人，都各具生活情态；而所涉及到的事件则无论大事、小事、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可见一斑。因而纵向和横向的交织就自然地勾勒出了古代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古代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面貌。本书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收藏价值。不仅是各级各类图书馆、博物馆、资料室、各级各类学校、研究院所、企事业党政机关、群团组织机关的理想藏书，更是广大从事领导工作、文秘工作、新闻工作、文史哲爱好者，以及从事民族、宗教、外交、公关、销售、权谋等工作的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一书在手，旦习观摩，“风声、雨声、读书声”将“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促使你“事事关心”，你将发现你的工作、学习、生活在不知不觉地改观，判断、识别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说不定，这将是人生转折的一个新起点。

本书在选材时，尽可能避免前人重文轻政、论文避政的倾向，

不少前人审视文学丛书，其立足点总是离不开那一丈见方的文坛，对“纯文学作家”或“专职文人”情有独钟，对那些居身显要，且在文学上颇有造诣的“兼职文人”不大感兴趣。本书编辑则抛弃了这种畛域之见，走出了象牙之塔，坚持“文质”第一的标准进行选裁，不论作家的身份，职别。况且文章乃经世致用之学，历代出将入相者大都是写文章的好手，李斯的《谏逐客疏》、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至今脍炙人口，令人百读不厌。先前的古典文学丛集中，对帝王的文章选得特别少，有的根本没有，我们对此作了调整。众所周之，一般帝王在其做太子之时，其父皇就为其指派了几乎是天下最好的老师朝夕督导，况且众多的文人墨客往往云集在他们周围，未必二十五朝历史，上千位帝王除了治国，就不关心文事。事实上乾隆皇帝的诗词创作，超过两万余首，其数量之多，足以使号称诗翁的陆游也不能同其相提并论。即使历代开国帝王，奔走疆场，戎马倥偬，无暇文事，但就连刘邦那种溺儒冠之辈，也能写出豪气十足的《大风歌》，项羽穷途末路还不忘高歌“力拔山兮气盖世”。至于商汤、姬发、曹操、李世民、萧衍，那更可以说文治与武功并驾齐驱。因此本书除了专职或以文事为主的文坛宿将外，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将相也占有一席之地，这样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的作家群可谓形形色色，既各具异彩，又共同绘制出反映中国古代文学原始风貌的丰富多彩的画卷。对读者来说，不仅可以更多地了解内容不同，风格各异的作品，而且可以藉此了解整个古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总体面貌。可谓事半功倍，一举两得。

此书规模浩大、编撰经年，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名文典籍、名人名家，我们组织了大批专家、学者对其整理归类，重新点校，这些专家学者孜孜不倦、呕心沥血的崇高治学精神，也是我们这套书的价值的一个方面。

由于本书所涉及的名文典籍太多，时间和空间跨度大，作家

群庞大，虽然我们处处谨慎、事事慎重，但不敢就此说本书已经完美无缺。如有疏漏之处，敬请广大专家学者和读者斧正。

关于诗词赋曲

诗词赋曲都是音乐性、节奏感比较强的文学体裁，且它们之间的演变存在着内在的承接关系。

诗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早形成的文学样式，产生于上古人类生产劳动之中。在劳动中，人们为了协调相互之间的动作，或者减轻疲劳，提高劳动效率，往往在劳动中发出一系列有节奏的呼声，这就是诗歌韵律的起源。据《淮南子·道应训》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礼记》中也有“邻有丧，舂不相”的记载。“相”即送杵声，它与“邪许”都是为了减轻疲劳，提高工作效率而呼喊的劳动号子，当然这种最简单的劳动呼声还不是真正的诗歌。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得到发展，人们在那些有声无义的韵律节奏中加入简单的语言。于是就形成了最早的诗歌。如《吕氏春秋·音初篇》中记载的《候人歌》：“候人兮猗”，就是在“兮”、“猗”两个语气词上加上“候人”二字。据说这是禹治水时，其妻涂山氏之女等候禹时所作。从它的极为简朴的形式可以断定为早期歌谣，从中不难看出原始歌谣与那些有声无义的劳动呼声的联系。如“断竹，续竹、飞土、逐突（肉）。短短的八个字写出了人们制造弹弓、射击弹丸、投击野兽的整个劳动过程，是一首质朴的原始猎歌。当然在原始的祭祀和宗教仪式中也产生了一部分原始歌谣，如《礼记·郊特牲》中保存的相传为伊耆民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蜡祭的祝辞，实际上具有咒语的性质，表达了原始人战胜自然，夺取丰收

的愿望。又如《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还有一篇令旱魃北行的诗：“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同样具有咒语的性质。

进入阶级社会后，人们口头流传的歌谣并没有消失，但不少作品染上阶级对立的色彩。在《尚书·汤誓》中有一首夏桀时的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仍是咒语的性质，但强烈的阶级对立和反抗压迫的愤激之情显而易见。

当然进入阶级社会后，特别是夏商周三代，表现阶级对立和反抗的主题并不是诗歌的主流。相反、诗歌的主流是作为统治者美教化、厚人伦、正风俗、实行礼乐治国的工具。周代已经设了采诗官，每年春季拿着木铎去民间采诗，藉此考察政治得失，或者使下情上达，为统治者制定决策提供依据。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作为美教化，厚人伦，淳风俗的工具，是同三代以礼乐治国的主张相适应的。

春秋战国以前，诗歌的创作大多是集体的创作。由孔子删定的《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出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诗经共 305 篇，收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 500 年间的作品，它产生的地域包括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一带，即广大的中原地区。《诗经》在春秋时已广泛流传，诸侯和大夫常在外交场合引诗表达情志。《诗经》的作品在当时都是配乐歌唱的，根据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个组成部分。“风”诗共 160 篇，包括周南、召南等十五国风，大部分是民歌。“雅”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共 105

篇（其中大雅 31 篇、小雅 74 篇）。“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舞曲。其中成就最高的部分当数《国风》，不仅广泛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而且其中也不乏讽刺、抨击统治者的诗；反映爱情和家庭题材的作品，如《齐风·鸡鸣》、《郑风·出其东门》；以及反映当时风俗礼仪的诗歌，如《周南·桃夭》、《郑风·丰》等。《诗经》的艺术成就在于以其平易质朴的风格，采用“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具体逼真地反映生活原貌，很多作品都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产物。语言准确生动、丰富多彩，特别是动词和形容词的运用已达到了相当巧妙精当地地步。句式较为整齐，以四言为主。

《诗经》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写实精神、赋比兴表现手法和自由活泼的诗歌形式为后世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力政，礼乐崩坏，强侵弱、众暴寡，诗的教化作用受到损伤。但其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得以加强，出现了文人诗和个人诗歌创作。战国后期，北方诗坛一片沉寂，南方的楚地、诗歌创作却大放光彩，出现了屈原、宋玉、唐勒、景差等个人诗歌创作，并产生了“楚辞”这一新的诗歌体裁。其中屈原的《离骚》堪称楚辞的集大成之作。

《离骚》共 370 多句、2400 多字，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屈原自述身世、理想以及参与政治革新而受谗被疏的过程；后一部分以幻想的方式表现诗人被疏后的不懈求索和最终选择。整部作品是屈原用全部理想、热情和生命凝聚而成的壮丽诗篇，体现了诗人崇高的思想境界和伟大光辉的人格形象。诗人在作品中驰骋丰富的想象和幻想，采用象征、比喻、拟人、夸张等手法，驱遣各种神话形象、历史人物、禽鸟花草纷至沓来，构成了瑰丽奇伟的艺术境界。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异常芳洁高大，从精神世界到外表服饰都带有理想化的特点，远远高出世俗之上。诗中自始自

终闪耀着光辉的理想和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屈原还在《离骚》中大胆地发展了《诗经》中的比兴手法，用具体鲜明的形象来比喻人的品质和志行，使比兴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些生动的比兴，使作品产生了蕴藉深厚，言近旨远的艺术效果。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称赞《离骚》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志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在语言上，句式长短相间，参差错落，比《诗》中的四言诗更富于表现力。诗中用了大量的语气词，造成了蝉联不绝，一唱三叹的韵味。这种别具一格的新诗体是屈原对诗歌的重要贡献。《离骚》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杰作。《离骚》而外，屈原的《九章》、《九歌》、《天问》、《招魂》、宋玉的《九辩》等对后世也颇有影响。

西汉开始，个人诗歌创作逐渐形成了一股潮流。四面楚歌方息，西汉开国元首刘邦的《大风歌》如鹰击长空，拉开了个人诗歌创作的序幕。继之而起的汉武帝、司马相如、王嫱、马援、班固、张衡、梁鸿、秦嘉、赵壹、蔡邕等都有不同凡响之作。诗歌创作从民间集体创作走向个人创作，是诗歌不断成熟的标志。东汉初年出现了文人五言诗的创作，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的创作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而以《古诗十九首》和秦嘉、徐淑夫妇、蔡邕、郦炎、赵壹以及无名氏等为代表的创作，以其出色的成就，宣告了文人五言诗的成熟。梁代钟嵘曾赞扬这些作品“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他们直接开辟了建安时代“五言腾踊”的局面，并成为后世诗人学习和模仿的典范。

汉乐府是汉代兴起的一种重要诗歌样式，是一种与音乐有关的诗歌体裁。汉乐府民歌主要出自下层民众之手，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直接地反映了作者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其

中有表现人民的苦难和反抗情绪的作品；反映战争和徭役的灾难；暴露和讽刺统治者的荒淫腐败；歌颂清官的政绩；表现爱情、婚姻、家庭生活。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叙事性，当然也不乏浪漫主义气息，语言质朴、自然、生动活泼，富于生活气息。形式灵活自由，篇章句式变化多端。《战城南》、《陌上桑》、《妇病行》、《孤儿行》等都是优秀的作品，而《孔雀东南飞》则代表了汉乐府的最高成就。

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它的大胆反映现实的精神在诗歌史上影响深远。后代凡是反映民生疾苦，暴露现实黑暗的诗作，往往采用乐府的形式，以至于批判现实成为乐府的一个特点。

至东汉末年，建安时期，以曹操、曹植、曹丕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邺下文人集团和蔡琰等继承和发扬了《诗经》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其诗歌创作充满伤时悯乱，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风格苍凉、刚健、遒劲，颇见风骨，这是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令人振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风格被誉为“建安风骨”。“三曹”和“七子”俱有不少风骨之作传世。

建安以后，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正始之音虽然真实地反映了三国鼎立时期的社会现实，但建安时期那种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减弱了，诗歌中流露出伤时悯乱与全身远害相混杂的情调，令人感伤不已。特别是司马氏集团取代曹氏集团的统治地位后，因政治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的厄运接踵而来。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得好死的时期，嵇康、向秀、谢灵运、谢朓、郭璞、鲍照等诗坛精英，都白白地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个时期到底被杀了多少人，我们已无法统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数目是怵目惊心的。乱世多才是祸根，全身远害、明哲保身的思想充斥着整个文坛，这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尤其表现得突出。诗人们多不关心世事，崇尚虚无，畅谈玄理，发

言不着边际成为时尚；纵情山水、恣意游乐、归隐田园等林下风流蔚然成风。

西晋初期，一方面拟古风气盛行；另一方面追求辞藻典雅、对仗工整、用典也成为时尚。这一时期的诗歌被称为“太康体”。诗歌创作从此“采缁于正始，力柔于建安”“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从而失去了建安、正始诗歌慷慨任气，感兴而发的深厚内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左思的成就最高，钟嵘《诗品》评其诗为“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代表作《咏史》8首不仅开创了借古人古事以咏怀抱的先例，对后来李白、杜甫等人的咏史抒情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晋末年、东晋时期，玄言诗、游仙诗盛行，“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诗人们畅谈玄理、崇尚老庄蔚然成风，体现了当时比较压抑的政治气候。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僧支遁、王羲之、郭璞等人。而陶渊明出淤泥而不染，一曲“归去来兮”之后，便“采菊东篱下”，以其清新，自然的诗风，开创了一个诗歌流派。不仅给死气沉沉的东晋诗坛带来新的气息，更对唐代孟浩然、王维等人的山水诗产生了重要影响。

到刘宋时期，山水诗的兴盛逐渐取代了东晋流行的玄言诗，其中谢灵运号为大家。他大量地创作山水诗，不断地探索山水诗的技巧，逐渐使山水描写由附庸玄言诗到蔚为大观、演变成山水诗，开拓了中国诗歌史上一个新的题材领域。山水诗而外，鲍照的拟古乐诗和七言诗颇有成就，特别是其七言诗，以其深刻的内容和灵活的形式，为文人七言诗的发展树立了典型，开辟了道路。从此，七言诗体在南北朝文人诗歌中日渐繁荣起来。

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时期，新体诗的特点是讲究声律和对偶，是古典诗歌从比较自由的“古体”逐渐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有

周顒、沈约、谢朓、何逊、阴铿、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等，其中以谢朓成就最高。

北朝文人诗坛与南朝的繁荣景象相比显得比较冷落，北魏末到北齐时期，才出现了号称“北朝三才子”的温子升、邢劭和魏收。他们的诗歌主要取法于南朝齐梁诗人。

南北朝后期，南北诗风呈现出合流的趋势，而对推动南北诗风合流贡献最大的当数庾信。庾信入北以后，以其南朝诗歌积累的纯熟技巧，描写深沉悲郁的乡关之思，融南朝诗歌的精密华美与北地民歌的质朴慷慨为一体，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开拓了文人诗歌的崭新境界。庾信的诗歌在格律方面也更为精美成熟，初步具备了唐代格律诗的格局，其晚年诗歌无论在意境，风格和形式格律等方面，都具有“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的重要意义。

从诗歌的题材上讲，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整个诗歌发展史上令人遗憾的时代。但尽管诗人们不关心世事，而在诗歌艺术的追求和造诣上显得非常执著。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沈约的“八病说”、鲍照的七言格律诗研究等都显示了诗人高深的艺术功底。这为唐诗的繁荣和发展作了质和量的积累。就连李白、杜甫、王维这样的大家都对谢灵运、谢朓、陶渊明、庾信等推崇备至，所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这样的真实写照。

魏晋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继续得到发展，出现了《木兰辞》、《采莲曲》、《西洲曲》等优秀作品。

到了隋代和初唐，中国社会在惨遭四百余年的割据分裂后重新走向大一统。适应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和宫廷享乐需要，上承齐梁时代的宫体诗、应酬诗，以其浓烈的脂粉气，吹捧气在帝国弥漫一时。另一方面，一大批有志之士，面对着统一帝国的日益强盛，要求继承《诗经》和建安风骨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积极反映现实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初唐四杰”的诗尽管显得文词华美，

但对齐梁以来的宫体诗、艳诗激烈反对。特别是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慷慨悲歌，揭开了诗歌创作在复古中求革新的序幕。其后继李白、杜甫、高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韩愈的积极倡导，以及其他诗人的推波助澜，唐诗在不断革新中得到完善和发展，唐诗至善至美的风采便油然而致。中国诗歌发展至此亦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如康熙皇帝所说：“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唐代诗歌的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初唐著名诗人有李世民、魏征、虞世南、上官仪、王梵志、刘希夷、张若虚等人。而成就最高的则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四杰批评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键不闻”，开始自觉地革除齐、梁诗风的余绪，他们的诗歌拓宽了题材领域，表现出激越雄浑的情调。陈子昂在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都表现出鲜明而自觉的革新精神，在他《修竹篇序》中批评齐梁诗歌“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主张恢复《诗经》的风雅传统和建安、正始充实的风骨”。体现了诗歌在复古中求革新的主张。

初唐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大事是唐代律诗的成熟。初唐时期的宫体诗人沿袭梁陈诗风的程式作法，促进了新体诗向律诗的演进。在这方面上官仪的诗作颇有影响，一时号为“上官体”，他还在实践创作的基础上，将六朝以来诗歌对仗的方法正式归纳为六对：一是正名对；二是同类对；三是连珠对；四是双声对；五是叠韵对；六是双拟对。这些对仗的规范化虽然是为写作宫体诗服务，但对发展律诗的对仗技巧也有一定的作用。五律的最后定型，七律的成熟是在武后、中宗时的宫廷诗人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手中最后完成的。沈宋的主要贡献是以他们的诗歌范例，完成了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最后定型的任务。于是当时“学者宗之，

号为沈宋”，后人也公认“五律自沈宋始可称律”“七言律滥觞沈宋”。

定型的唐代律诗，利用和发展了齐梁新体诗偶然出现的粘对规则，解决了两个律联之间的平仄关系问题，使一联之间平仄相对，两联之间平仄相粘。一对一粘，错宗变化，唐代律诗还确定了四韵八句的形式，规定了中间两联必须对仗；总结出首句可用韵，可不用韵，押平声韵，一韵到底的规则。从此唐诗有了完整的规范，逐渐盛行起来，近体诗和古体诗也有了明确界限。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伴随着帝国的空前强盛，唐代诗歌也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代。一方面诗歌内容充满奋发、进取的精神，另一方面名家纷呈，无论从题材、内容、表现形式，都呈现出空前的盛况。盛唐诗歌创作出现了很有影响的两个流派：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山水田园诗派以孟浩然、王维、储光羲、裴迪、常建、邱为、綦毋潜为代表。他们大都是在个人仕途失意且政治热情减退的情况下，接受佛道思想影响、寄情山水田园的。他们的诗侧重于描绘幽静秀美的自然境界，表现闲淡清远的个人心境。在艺术上则融合陶渊明，谢灵运、谢朓之所长，又有所发展，创造了情景相生，意趣盎然的审美境界，显示出唐代文化多姿多彩的繁荣气象。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翰为代表，他们的诗作多写惊心动魄的军旅生活和绚丽多彩的边塞风光，也集中地表现了唐代士人慷慨任侠的男儿风度和建功边塞的英雄气概。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西师出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昌龄的《出塞》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更令人骄傲的是盛唐出现了李白、杜甫二位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自小“观奇书”、“游神仙”、“好剑术”，有多方面的才能和兴趣，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但终其一生壮志未酬。其诗今存 990 多首、体裁多样，擅长七言

绝句，有很多乐府诗，律诗也不乏佳作，但最能代表其成就的当数七言古诗和五言古诗。李白的诗歌创作中有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充分展示了诗人非凡的抱负，奔放的激情，豪侠的气概，集中代表了盛唐诗歌昂扬奋发的典型音调。李白诗歌想象神奇、变化无端，句式长短错落，形成了雄奇飘逸的风格。太子宾客贺知章因赏识李白诗歌和风采，赞许他为“谪仙人”，后世誉之为诗仙，诗风雄奇瑰丽，飘逸不群。

杜甫是唐代盛极而衰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出现的伟大诗人，出身于世世代代“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思想，走着“达则兼济天下”的道路，但其理想没有获得伸展。目睹唐王朝的种种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以及安史之乱带来的种种灾难，诗人用沉郁顿挫的笔触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系列的生活和重大的社会事件，因而也赢得了“诗史”、“诗圣”的赞誉。杜甫的诗歌现存 1400 多首，不仅在内容上博大精深，而且在艺术方面也“千汇万状，兼古人而有之”。他能驾驭当时所有的各种诗体，并创造性地发挥了这些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位承前启后，影响极为深远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在题材、内容、诗歌体式和修辞技巧方面，都集前人诗歌传统之大成，并有所创新和发展，并对中晚唐以后众多诗人和诗歌流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唐时期诗歌发展无论从内容、题材、风格都进一步多元化，而且诗坛上流派峰起，名人辈出。中唐前期活跃于诗坛的有以钱起、司空曙、卢纶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和元结、顾况、刘长卿、韦应物等。元结、顾况的诗，延续了杜甫反映民生疾苦，规讽时政的创作道路，又直接开启了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刘长卿擅长五言，号称“五言长城”，他和韦应物的诗歌都颇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十才子”的诗虽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安史之乱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但更多的是抒写个人生活的闲雅情趣以及战乱